

張居正

与万历皇帝



樊树志 著



中華書局

樊树志 著

张居正与万历皇帝



中华书局

ZHONGHUA BOOK COMP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/ 樊树志著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8. 5

ISBN 978-7-101-06073-7

I. 张… II. 樊… III. 张居正(1525~1582) — 人物研究 IV. K827 = 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3689 号

书 名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

著 者 樊树志

责任编辑 李 静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14¼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6073-7

定 价 29.00 元

引言

张居正，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。他所进行的改革，雷厉风行，大刀阔斧，由于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全力支持，成效显著，一举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，而彪炳于史册。

这是人们通常对他的了解。

人们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环节：他死后，皇帝翻脸不认人，说他“专权乱政”、“谋国不忠”，甚至想对他“断棺戮尸”。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官僚随声附和，乘机落井下石，诬蔑张居正“残害忠良，荼毒海内”，扬言：“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。”

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，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，竟然成了社稷罪人，这是为什么？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？

——“威权震主，祸萌驂乘。”

这八个字是当时人提供的答案，言简意赅，揭示了张居正悲剧的根源，在于他显赫的权势，与皇帝的容忍度之间的矛盾，在那种体制下，是难以调和的。任何一个皇帝（除非他是白痴），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凌驾于他之上，让他感受到震慑。因此“祸萌驂乘”便不可避免。

然而，这毕竟令人遗憾，留下刻骨铭心的感叹，引起了人们纷纭的议论。

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，也为之愤愤不平，说：“江陵（指张居正）宰相之杰也，故有身死之辱。”称赞张居正是“宰相之杰”，对于他死

后遭到政治性凌辱，耿耿于怀，流露出正直人士对张居正的怀念，对朝廷的不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贽说这话的时候，万历皇帝正在紫禁城的龙椅上，亲操政柄，他发表这样的意见，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人们在欣赏李贽凛然气节的同时，也可以察觉到当时舆论界心目中的张居正，必有过人之处，令人难以忘怀。

自从上世纪中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《张居正大传》问世以来，书中的主角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历史学家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中文版，自1982年至今，畅销不衰。他以独特的视角，流畅的文笔，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，用“世间已无张居正”这样的标题，来抒发他对张居正别具一格的评价，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，以及多种多样的评论。看来，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多侧面的张居正及其时代，至今依然是大家关注的话题。

笔者把题目定为“张居正与万历皇帝”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张居正在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担任内阁首辅，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，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，得以“代帝摄政”。凭借这样的特殊身份，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，雷厉风行，势不可挡。当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，称之为“朝下令而夕奉行”，“中外淬砺，莫敢有偷心”。真所谓言必行行必果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，改变了嘉靖以来政局颓靡，财政亏空，边防废弛的局面，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，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，缔造了万历时期最为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。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。

改革与改革家，是近年来一个热门话题，这或许是现今人们依然对张居正怀有兴趣的原因所在吧！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，把张居正与历史上的改革家加以比较，姑且不论吴起、商鞅，即以王莽、王安石为例，他们改革所取得的成效，都难以与张居正比肩。

这是什么原因？确实值得深长思之。

日本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上课时，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：“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家，都认为实行《周礼》毫无价值，而最近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的人，则对其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赏。但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。《周礼》中的政治，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订的……应

用《周礼》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，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张居正没有重复王莽、王安石的改革模式，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动向。

张居正是科举正途出身，从秀才、举人直至进士，并且在儒学气息极为浓厚的翰林院工作多年，受儒术的熏陶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，他并不沉迷于经学。他深知，社会的弊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，要想拨乱反正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儒术和经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，必须用法家理论和权谋，下一剂猛药。

张居正深谙法家真谛，把它用儒术加以缘饰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，他特别强调“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”这一法家名言，在施政时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。他在与同僚议论治国理念时指出，他开始执政之前，“国威未振，人有侮心”，因此必须推行法治，依法治国。他是这样表达的：“一切付之于大公，虚心鉴物，正己肃下。法所宜加，贵近不宥；才有可用，孤远不遗。务在强公室，杜私门，省议论，核名实，以尊主庇民，率作兴事。”

张居正的立身处事，充分显示了上述风格。他自诩为“非常磊落奇伟之士”，不愿意“徇匹夫之小节”，因为他有更大的抱负——“慨然以天下为己任”，所以他可以做到“嫌怨有所弗避，劳瘁有所弗辞”。为了依法治国，一定要做到“虚心鉴物，正己肃下”，目的是达到这样一个境界：“法之必行”，“言之必效”，“朝下令而夕奉行”。这种说一不二、令行禁止的风格，这种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风格，体现着崇尚“霸道”（而非“王道”）的法家精神。

正因为如此，张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气质，少有仁恕的精神，事事处处都是咄咄逼人的严刑峻法，讲究权术与谋略，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，手法十分老练圆熟，可以置脸面于不顾，可以对言官的弹劾、舆论的非难，熟视无睹。

所以在后人的眼中，作为政治人物的张居正，既是一个改革家，也是一个政客。以往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，讳言政客的一面，其实是大可不必的。否则就不可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。改革家和政客，一身而二任，是他的两面，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面，对他的认识都是片面的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对他的盖棺论定，就注意到他的两面。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：“成君德，抑近

幸，严考成，综名实，清邮传，核地亩”；另一方面指出他的过失：“偏衷多忌，小器易盈，钳制言官，倚信佞幸”。这前面所说的十八个字，概括了他作为改革家的事功；后面所说的十六个字，正是他作为政客的本性使然。为了夺取内阁首辅的交椅，他可以不择手段，与太监头子冯保联手，心狠手辣地整垮高拱，进而施加政治迫害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甚至可以置伦理道德、社会舆论于不顾。他的悲剧，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吧！

著名的清官海瑞，并非张居正的“同党”，恰恰相反，对张居正政见多所非议，但是，他对张居正的评价是公正的。对他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——不仅自己身败名裂，而且连累家属，情状惨不忍睹，而感慨系之。海瑞总结其中的缘由，说了一句极富洞察力的话：张居正“工于谋国，而拙于谋身”。所谓“工于谋国”，当然是指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，力挽狂澜，成效显著。所谓“拙于谋身”，就意味深长多了。既是说他无所顾忌地推行改革，树敌过多，结怨甚深，没有处理好与同僚、下属的关系；更是说他得到太后与皇帝的充分信任，权力达到巅峰状态时，过于肆无忌惮，而不知收敛，忘乎所以地自诩：“我非相，乃摄也。”这在帝制时代是有“僭越”嫌疑的，也就是所谓“威权震主”。无怪乎《明实录》在为他“盖棺论定”时，写下了发人深省的一句话：“威权震主，祸萌驂乘。何怪乎身死未几，而戮辱随之！”

“威权震主，祸萌驂乘”这八个字，就是张居正悲剧的根源。无论功勋多么卓著的首席大臣，在皇帝眼里不过是“臣子”而已，绝对不能“僭越”，使皇帝感受到震慑。张居正如此精明强干的政治家，居然对于这个关键有所疏忽，忘乎所以，难怪海瑞要说他“工于谋国，而拙于谋身”了。

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。

读者诸君欲知其详，请听在下细细道来，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。

目 录

——1—12

一、初涉政坛的徘徊

1. 家世与科举/3
2. 彷徨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/6
3. 恩师徐阶的虚与委蛇/8

——13—30

二、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

1. 严嵩何许人也/15
2. 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/19
3. 严氏父子的下场/26
4. 海瑞骂皇帝/28

——31—42

三、逢迎于徐阶、高拱之间

1. 张居正重回官场/33
2. 徐阶主政/34
3. 隆庆时期的内阁纷争——张居正的《陈六事疏》/38

43—62

四、权力博弈：“附保逐拱”

1. 隆庆皇帝的去世/45
2. 冯保其人其事/47
3. 顾命大臣内讧/49
4. 高拱与冯保斗法/52
5. 高拱的垮台：“回籍闲住”/56

63—76

五、“王大臣案”的阴谋与是非

1. 图谋行刺皇帝的“王大臣”/65
2. 株连高拱的密谋/67
3. 阴谋的破产/70

77—94

六、代帝摄政的首辅与帝师

1. 小皇帝朱翊钧/79
2. “元辅张先生”/84
3. 慈圣皇太后李氏/87

95—116

七、万历新政：改革与逆流

1. 改革的前奏/97
2. 万历新政的渐次展开/99
3. “不许别创书院”——矫枉过正的改革/103
4. 怨声甚嚣尘上/107
5. 傅应祯、刘台的反对声浪/109

117—140

八、“夺情”风波的前前后后

1. 张居正九年考满/119
2. “夺情”的台前幕后/121
3. 围绕“夺情”的风波：弹劾与廷杖/128
4. 舆论的反响/134
5. 弹劾与廷杖的再现/137

141—152

九、改革向纵深发展

1. “不加赋而上用足”/143
2. 清丈田粮：丈量耕地与清理赋税/146
3. 一条鞭法：赋税与徭役的货币化/150

153—172

十、皇帝的大婚与张居正的“归葬”

1. 大婚的吉期/155
2. 皇帝的婚礼与太后的慈谕/156
3. 张居正的“归葬”/161
4. “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”/166

173—188

十一、张居正之死与冯保的垮台

1. 张居正的病情/175
2. 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/180
3. 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垮台/183

十二、对张居正的清算

1. 政治形势的剧变——弹劾张居正的汹涌浪潮/191
2. 为刘台平反/195
3. 辽王案与张居正/200
4. 张居正的抄家厄运/204
5. 张居正的悲剧——“威权震主，祸萌驂乘”/214

一、初涉政坛的徘徊



张居正

1. 家世与科举

嘉靖四年(1525),张居正出生于荆州府江陵县。荆州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地方,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。然而张居正的原籍并不在这里。

他的远祖张关保是凤阳府定远县人,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同乡,也是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为核心的“淮西集团”众多文臣武将的同乡。元朝末年,张关保和乡亲们一样,参加了造反的红巾军(又称红军),追随朱元璋,南征北战。

明朝建立后,张关保被授予军职,分配到荆州府的归州。从此,张家后人便成了荆州人氏。张居正曾祖父张诚,从归州迁移到江陵县,在此定居。所以,张居正科举考试填写的履历表“籍贯”一栏,就写着荆州府江陵县;待到他显赫以后,人们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,尊称他为张江陵先生,或者索性叫他“江陵”。犹如江西贵池人夏言叫做“贵池”,江西分宜人严嵩叫做“分宜”,河南新郑人高拱叫做“新郑”,松江华亭人徐阶叫做“华亭”,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称呼方法。

张居正的家世并不显赫,世袭的军户身份,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,家境也属于贫寒一类。父亲张文明,想通过科举道路改变家庭的境遇,多次参加考试,都名落孙山,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,终其一生,只是一个落第秀才而已。张居正后来为父亲写的小传《先考观澜公行略》,谈起这一点,似乎有为尊者讳的意思,称赞父亲从小就很“警敏”,“为文下笔立就,不复改窜,口占为诗,往往有奇句”,简直是一个才子,唯一的缺点就是“不能俯首就绳墨”——不愿埋头钻研四书五经,学问方面差了一些。张文明自己也知道学问不行,就把全部梦想都寄托于儿子身上,希望他科举仕途顺利,跃登龙门,改变张家的困境。

张居正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,发愤攻读,学识卓异,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,还算比较顺利。这得归功于两位伯乐式的恩师的提携。

第一位恩师就是李士翱，这位荆州知府在主持童生考试时，发现名叫张白圭的少年很有才华，非常欣赏，认为白圭这个名字不好，帮他改名为居正，不仅对他寄予厚望，而且极力向湖广提督学政田頔推荐。田頔当场出题考试，张居正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，发榜时果然名列榜首。一时间，“荆州张秀才”声誉鹊起。张居正飞黄腾达后，对恩师李士翱的奖掖始终念念不忘。

第二位恩师是顾璘。这位湖广巡抚慧眼识英才，在众多参加嘉靖十五年(1536)武昌乡试的秀才之中，看中了年仅十二岁的张居正，对他赞誉备至，特地写诗相赠，称赞他“今看十岁能长赋，何用从前咤陆机”，令居正感怀不已。

张居正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，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，依然记忆犹新，感恩戴德。他说，湖广巡抚顾璘初次见到他，就赞誉他是“国士”、“神童”，把他引为“小友”。顾璘多次对同僚说，这孩子将来有治国的“相才”，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邕侯(唐朝宰相李泌)相媲美。有一天，顾璘在家中设便宴款待居正，叫他的小儿子顾峻出来相见，介绍说，这位是荆州张秀才，将来担任中枢要职时，你可以去求见，他必定会感念昔日老朋友儿子，出手帮你一把。张居正谈起四十年前的这些细节，历历在目，仿佛昨天的事情，流露出对于顾公知遇之恩刻骨铭心的感念，只有以死相报，才能了却这一段恩情。这时的他已经位极人臣，权倾朝野，一般情况下很少向人透露内心的隐秘，他却向朋友坦然表示这段恩情一直埋藏在心中，从未忘却。遗憾的是，顾公过世以后，顾府家道中落，他如果无以为报，必将铸成终生大恨，恐怕无脸再见顾公于黄泉了。由于他一再请求朋友帮忙，才使顾公的后人得到照顾，才不至于有忘恩负义的遗恨。这是后话，暂且打住。

少年张居正发愤努力，果然没有辜负李翱与顾璘的期许。不过也经历了一些曲折。他虽然被誉为“神童”，但科举考试并不顺利，举人考了两次，进士也考了两次。也就是说，乡试与会试的第一次都落第了。看来张居正并不是应试教育的宠儿，也不是死记硬背的能手。

嘉靖十九年(1540)，他再次参加湖广乡试，考中举人。四年之后，进京参加会试，结果意外地落第，没有被录取为进士。这使得被誉为“神童”的

他颇有意料之外的失落感，或许是少年得志有些忘乎所以，才马失前蹄？他后来在给儿子张懋修的信中回顾这段往事，并不怨天尤人，而是有所检讨的。他坦然地说，由于小小年纪轻易地取得秀才、举人的功名，有些忘乎所以，以为进士及第是“唾手可得”的事，于是乎放松了学业，尤其是放松了科举考试的本业——四书五经的钻研，心有旁骛。确实，张居正对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所谓“制艺”，是不屑一顾的，他有更深的关注点——与“治国平天下”紧密相关的政治实务。落第以后，他幡然悔悟，不得不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，埋首于四书五经。

嘉靖二十六年(1547)，是丁未年，丁未会试与殿试，张居正都顺利通过了。他终于登上了科举的最高台阶，跃登龙门，进士及第。从此，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。按照常规，新科进士必须有一个见习的过程，张居正也不例外，被分配到翰林院担任庶吉士。翰林院是负责编写历史和管理图书的中央政府部门，庶吉士是没有官品的练习生，新科进士经过庶吉士阶段，才可以授予有品级的官职。

仅仅从字面上理解，翰林院似乎是一个清闲机构，其实不然。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，翰林院至关重要，进入内阁的官员大多是翰林院出身，而内阁是中央政府的中枢。庶吉士虽然只是练习生，没有官品，却是通向内阁的起步。当时人把庶吉士看作“储相”——内阁的人才储备处，内阁大学士的候补队伍，并非夸张其辞。

不久，张居正被分配担任翰林院的编修。这个“编修”职务，是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。在这个岗位上，他居然徘徊了十年之久。

丁未会试的主考官孙承恩、张洽，成了张居正的座主；分房考官陈以勤、吴维岳，披阅他的考卷，成了他的房师。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的都是一时之选。一甲第一名李春芳，后来成为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与同事。其他如殷士儋、王世贞、汪道昆、王宗茂、凌云翼、陆光祖、宋仪望、杨继盛等，都声名显赫，正如朱东润《张居正大传》所说：“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，第一流的文人，立功边疆的大帅，弹劾权幸的忠臣，可算得人甚盛。”

2. 彷徨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

十年寒窗，一登龙门，从一介寒士变为一个官僚，对于张居正而言，意味着远大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。但是，今后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官场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纷争，仕途是坎坷曲折的。即使像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，也会丧失自信，打退堂鼓，既出乎意料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在担任翰林院编修五年之后，即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，他以健康不佳为理由，辞职回乡。对于从不言败的张居正而言，无疑是一件咄咄怪事，需要细细的分析。回家休养身体，固然是一个理由，但这个理由太不充分。真正的理由是对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感到彷徨，无所适从，不如跳出圈子，图个清静。这完全不像张居正的性格，他后来身处权力中心，纵横捭阖，得心应手地玩弄权术，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。

五年之前，他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治国理念。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，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奏疏——《论时政疏》。这份奏疏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，关键在于皇帝沉迷于道教，不理朝政，拒绝大臣的批评，导致政局日趋紊乱。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：宗室藩王骄纵恣肆，官吏荒废本职工作，吏治因循腐败，边防武备废弛，财政连年赤字。应该说，这些批评都是抓到要害的。为了使得皇帝能够接受这些意见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切的进谏，因而在青史留名；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，使得国事避免失误，因而功勋流芳百世。

然而，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最不喜欢臣下向他谏诤，听不得批评意见，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奏疏当然不在他的眼里。张居正满怀希望的进谏，一如石沉大海，毫无回音。这令他感到伤心，对朝政感到失望，这恐怕是促使他辞职回乡的一个原因吧！

但是，还有更加震撼的事件发生，促使他断然下定决心，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那就是内阁首辅夏言被处死事件，这毫无疑问是政坛大地震，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新闻。

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臣，有才干，有抱负，但为人锋芒毕露，行事无所顾忌，遭到他的内阁同僚、江西同乡严嵩诬